

中国教育史上 的一次创举

——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纪实

张寄谦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教育史上 的一次创举

——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

张寄谦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 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纪实/张寄谦编.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9

ISBN 7-301-04347-3

I. 中… II. 张… III. ①教育史-中国②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IV. G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1539 号

书 名: 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纪实

著作责任者: 张寄谦 编

责任编辑: 何瑞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347-3/K·0272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5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8.125 印张 470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内 容 简 介

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是抗日战争烽火中,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次创举,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无畏精神和伟大的凝聚力。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 201 幅图片,名为“真实的纪录”。搜寻到 18 个小分队各分队的团体照以及旅途全程生动的照片。

另一部分是旅行团人员亲笔撰写的文字资料。最为可贵的是十余万字杨式德、余道南和董奋从未发表过的日记,文笔清新生动具有极大的感染力。

本书为中国教育史、文化史、抗日战争史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很珍贵很丰富的文献资料,对今日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二部分 历史的进程(文字资料)

档案

1. 长沙临时大学常委关于迁校的决议 (107)
2. 长沙临时大学关于迁校的布告 (108)
3. 长沙临时大学关于迁校暂行计划的布告 (108)
4. 长沙临时大学关于颁布修正学生经济就学基金的公告 (109)
5. 教育部函请教育部补助难苦学生旅费信 (112)
6. 教育部函请教育部补助难苦学生旅费的布告 (114)
7. 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关于迁校费用问题的通知 (114)
8. 长沙临时大学关于迁校就学的公告 (115)
9. 长沙临时大学迁行发给平津流亡学生可立学生名单 (115)
10. 长沙临时大学迁行休学不能步行学生名单 (117)
11. 教育部关于长沙临时大学改变校名的电文 (119)

序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这首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虽然于1939年7月才经联大校委会批准并呈报教育部备案，此时昔日的湘黔滇旅行团的健儿，已有一届离校(38级)，一届整装待发(39级)，但是校歌前半阙委婉的辞句，苍凉的旋律，概括了旅行团慷慨辞别长沙登上征途的情景。

一、动荡的时代洪流

清华大学应该说是时局动荡最敏感最有远见的机构。远自1935年6月所谓的何梅协定签订，^①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和国民党党部自河北撤退，11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傀儡政权成立，华北岌岌可危。清华大学就把一项巨额基建基金转拨于长沙岳麓山下一整套校舍的基地建设，预计1938年初完工交付使用。清华大学各系把最急需的仪器图书紧急装箱，连夜由清华园火车站南运至汉口租界存放。当年还是少壮的陈岱孙、叶企孙都亲自参加指挥火车站的搬运。因此七七事变爆发，在庐山上应邀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各界人士座谈会的清华、北大、南开校长才下山到南京，便被教育部指定三校联合以长沙为校址组织第一临时大学，是以清华几年前就筹建的长沙岳麓山基建为物质基础的。然而清华大学当局的远见也仅是放弃华北，谋求稳定于华中为止。没有料到七七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战争的开端，中国人民面临着一场浩劫。

^① 按，据近年台湾对何应钦所作的口述历史调查以及日本对梅津所作的访问调查，均证明并不存在所谓的何梅协定。但无论协定的真伪，其对当时历史事件的发展，就和真的所起作用相同。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所造成的损失,难以罄书。我国沿海地区平、津、京、沪、杭州、广州的国立私立高校,地方和中央科研机关,三十余所无不辗转内迁,不仅专科学校,即中等学校也有个别的被迫越省迁移。有的高等学校,如浙江大学自杭州而浙江天目山、建德,而江西吉安、泰和,而广西宜山,而贵州湄潭、遵义,三年之中七次迁播。北平师范大学先奉教育部令组成第二区临时大学于西安,后来师生徒步迁移汉中,中途一位教师不幸逝世。这里所说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的迁移尚未涉及战火尚未波及的地区华中、中原一带(湖南、湖北、河南、山西等省),事实上就是川、陕、黔、桂等地学校也在搬迁(如四川大学由成都迁至峨嵋)。

据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领衔和张伯苓、胡适、蒋梦麟、罗家伦、梅贻琦等 102 人于 1938 年 11 月 6 日发表的英文声明谴责日本军队对我国教育机关的毁灭,“实为日方最恶之暴行,且亦为世界文明史上之最大污点。”日方之暴行,有计划有系统,如中央大学,最初即为日本空军圈定的目标,陆续惨被轰炸四次;又如南开大学,轰炸之不足,继之以焚烧,全成焦土。“诚所谓中国三年建设之不足,而日本一旦毁之而有余。”

在这种动荡的历史洪流之下,长沙临时大学的在校学生人数遭到很大的冲击。据北京大学档案藏长沙临时大学名录,全校学生数为 1716 人,经过 1937—1938 年参加抗日工作等,据学校决定迁校后 2 月 10 日公布的赴滇就学总名单为 878 人,即占 1716 人的 51.16%,而同日分类公布的批准发给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的为 284 人,乙种体弱不能步行名单为 97 人(名单 100 人,其中黄培云、黄钺、梅镇岳请求改为甲种),共 381 人都是准备参加旅行团而参加体检的人。其余的除去 186 位女生,约有 300 余人,则是准备自行赴昆的。(根据清华大学档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名录(1938 年 1 月)第三卷 41—97 页记载学生 1635 人,其中 691 人申请到各种军事机关、军事工程、空军学校、十四军政治工作以及奔赴前线等占 42.26%,

但这个名录记载的,除熊汇荃、池际尚、李朴、陈舜瑶(女)外,事实上大多数均未成行。)

这些先后离校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同学,在八路军中作出卓越成绩的有武衡、李伟(李鼎声)、宋平(宋延平)、陈舜瑶(女)等,在国民党第一军随军服务团作了工作的有熊汇荃,除一部分流失的以外,许多人陆续又回到学校,如参加辋重学校的章文晋、吴仲华、孟庆基,参加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池际尚等。据董奋日记记载,他因为想要参加抗日军队工作未能如愿,十分苦恼,他和许多同学不理解学校当局决定迁校的措施,他们曾组织反对抗议等活动,最后不得已还是报名检查身体参加了旅行团。其实这时前些天和他告别参军令他欣羡不已的吴匡也已回校参加旅行团了。回过头来看,临时大学当局的决策是对的,决定搬迁的时间是及时的(稍迟则遭遇长沙大火,日机开始轰炸岳麓山清华已告完工的基建工程),所选择搬迁的地点也是有远见的。旅行团自1938年2月19日晚8点自长沙发船启程,至4月28日抵昆明,共行69日,行程1663.6公里,号称3500华里。顺利地完成大批同学由湘至滇的转移。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已抵昆明的校方奉教育部电令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二、从湘入滇的三条路线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师生由湘入滇采取了三条路线(请参见本书所载“长沙临大师生三路入滇示意图”)。一条是湘黔滇旅行团路线,一条是境外路线。由长沙乘粤汉路至广州,到香港乘船到海防,再乘滇越路到蒙自、昆明。教师及眷属,体弱不适于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走这条路线。女同学由黄子坚夫人黄梅美德率领。走这条路线发表纪行的有浦薛凤先生的《由港至滇》等。

临大从湘入滇的第三条路线是陈岱孙先生积极组织的,由长沙沿湘桂路到桂林、南宁、镇南关(今友谊关)到河内走滇越路到蒙自、昆明。编者1994年曾陪同现代史教研室准备作口述历史的刘一臬同志专访过陈先生,陈先生兴趣很浓地谈了这条路线,说到同行的有

朱自清、冯友兰等，冯友兰在车通过凭祥隧道时，探臂窗外，遭致骨折。朱自清和陈岱孙在河内陪他养伤直至他弟弟冯景兰赶来护理。

其实，长沙临大由长沙到昆明还有一批教师走了第四条路线，就是郑天挺先生组织的北大教师、家属由长沙乘汽车到昆明的路线，他们一行十几人，周炳琳夫妇及子女、赵迺抃、魏建功等坐包车，郑先生、章廷谦、姚从吾和张佛泉等坐长途公共汽车，2月15日出发，3月1日顺利抵达昆明。还有三位同学清华11级的黎盛斯、萧嘉魁、12级的贺善徽也走了这第四条路线，从长沙乘长途汽车，用去七八天到达昆明。（据贺善徽：《从长沙到昆明》，载《清华大学十二级级友通讯》第三期。）

三、湘黔滇旅行团的组织

长沙临时大学当局决定组织同学赴滇其措施逐步有所变化。其基本宗旨是让同学们接受一次接触社会实际的教育。“借以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这个宗旨始终没有变化。但是由于路途长遥，人数众多，指导保护诸多不便，降低要求，只要求学生抵昆明后，得将沿途调查或采集所得作成旅行报告书，其成绩特佳者，学校予以奖励。看起来缴呈“旅行报告书”并奖励成绩特佳者也没有执行。

另外，原来要求同学全部步行，由袁复礼保存的《临时大学学生军由湘经黔入滇行军计划要图》（1938年3月）就是一件自常德完全步行的计划。路线和后来实际行军的道路一致。1938年2月学校关于赴滇路线的报告，就出现“湘黔滇旅行团”的字眼，规定乘车、船和步行（读者请自行查看档案，不赘述）全程1671公里，计步行688公里，占41.17%，乘船361公里，占21.66%，乘汽车622公里，占37.22%。

学校发给学生的旅费是每人20元，发给教授的是每人65元，全校有51位教职员愿将自己的旅费捐助给寒苦体弱不适于长途步行的男生和女生，条件是家境贫寒，家在战区，成绩优良，年级较高。表

现了临大师生之间的友爱。

尽管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不赞成长沙临大的搬迁,但他还是应临大校当局的要求派了一位资深的军官担任旅行团的团长,黄师嶽中将参议。旅行团采取军事管理,另有旅行团参谋长毛鸿上校和邹镇华中校与卓越中校分任第一、二大队队长。中队长与分队长由同学担任。

为了领导旅行团,学校组织了 11 位教师随团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领导,他们有中文系的闻一多教授、教员许维通、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李继侗教授、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化学系曾昭抡教授;地学系袁复礼教授、助教王钟山。

参加旅行团的究竟有多少同学?

根据临时大学 2 月 10 日公布的发给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是 284 人。登上行程以后,2 月 26 日杨式德的日记记载旅行团全体 335 人,想来这是一个团部发出的数字,包括一应人员全在内。

同学们在 2 月 10 日赴滇就学总名单公布以后报名参加旅行团的有参加一大队四分队的南开电机系一年级高小文,二大队一分队的北大算学系二年级的陆智常。另外还有北大经济系三年级的余道南和白展厚(据余道南日记),没有记录他们参加了哪个小分队。连同名单上的 284 人,共计 288 人。多亏杨启元的帮助,他查阅了长沙临大学生北大和清华档案,整理出旅行团成员在各院系所占名额,列表如下:

长沙临时大学各院系参加旅行团人数统计表 总人数 288

院 系	参加旅行团人数	院占百分比 %
文学院	60	20.83 %
中国文学系	12	
外国语文学系	19	
历史社会学系	17	
哲学心理学系	12	

续表

院 系	参加旅行团人数	院占百分比 %
理学院	75	26.04 %
算学系	12	
物理学系	15	
化学系	22	
生物学系	7	
地质地理气象学系	19	
法商学院	69	23.95 %
政治学系	12	
经济学系	51	
法律学系	6	
工学院	84	29.166 %
土木工程学系	40	
机械工程学系	21	
电机工程学系	23	
化学工程学系	0	

这个统计表中没有列入因各种原因未能取得合格成绩,但尚情有可原准予自费(交 50 元)随旅行团赴滇的学生。其中有南开的申泮文,清华的林从焕(林从敏之弟),黄钰生先生的侄子黄辉(音译)。申泮文参加一大队二中队六分队杨启元分队,抵昆明后学习优异。林从焕参加一大队二中队五分队黄培云分队,抵昆明后入化学系 A002。黄辉随黄钰生先生同行直到安南事件后退出。旅行团学员共 290 人。还有一位大公报记者戚长成清华大学毕业生随团同到昆明。

但情况并未终结。旅行团由邹镇华和卓超两位教官分任第一、第二大队长,每个大队分三个中队,每个中队分三个小队共十八个小分队。靠了冯绳武夫人阎敦淑的帮助,借到了十七个小分队的团体照,又靠潘钊元长子潘振武的帮助翻拍了所缺的一大队二分队的照

片。使我感到困难的固然是我寄出的照片复印照直到最近还有两个小分队无人辨认。屠守锷小分队健在的成员李宏纲包括台湾的许乃良都复信说找不到他们小分队，屠守锷还说他记不起有小分队拍合影这件事。令我尤为困惑的是这些照片上所记录的小分队成员的人数(缺拍的人已计算在内)。

一大队：一分队 13 人，二分队 13 人，三分队 15 人，四分队 13 人，五分队 13 人，六分队 16 人，七分队 11 人，八分队 16 人，九分队 11 人。二大队：一分队 15 人，二分队 16 人，三分队 13 人，四分队 15 人，五分队 15 人，六分队 13 人，七分队 8 人，八分队 15 人，九分队 15 人，屠守锷分队 7 人。共计 253 人。比旅行团成员应有 290 人减员 37 人。

减员的原因是生病。我收到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金宝祥教授的信说，他在常德和北大英语系的浙江老乡因食物中毒退出步行坐长途车直达昆明(1997 年 7 月 28 日)。另一位是长春东北师大中文系何善周教授的来信说，他自常德即患疥疮，到沅陵风雪重感冒，至晃县昏迷，专人送至贵阳医治(1997 年 7 月 2 日)。

土木系的杨连，行至汀西，因腿病不能继续前进，又返回常德住院治疗，出院后继续疗养，于 1938 年赶到昆明，在联大改读化工系，1942 年毕业(据 1991 年《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 1941 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余道南同班同学白展厚与旅行团成员张盛祥也因病中途请假乘车至昆明。

小分队合影照片记下摄影地点的有一大队一分队和二大队五分队均在霭益，二大队九分队在安顺。只有二大队三分队梅镇岳和田方增小分队，梅镇岳说是在长沙照的。估计大部分都是后期快结束时期的摄影，所以减员多些。

据李象森回忆记载，因病先期到昆明的同学，在大队到昆明时穿着整齐一一归队。因此黄团长才能将从长沙带出的点名册一一点名后交还给梅贻琦常委。

四、黄团长的带兵艺术

旅行团有两位黄团长。黄钰生先生掌理财会，与同学接触不多，黄师嶽中将则要带领同学朝夕与同学一起。

黄师嶽据说是安徽人，原来在东北军。东北军自被迫进关后，军队大量缩编遣散，张学良嫡系奉命守西北与红军对峙。黄师嶽则赋闲下来，任中将参议，闲居在北大沙滩附近，经常去北大旁听课程，因此思想颇能跟上时代潮流。张治中主湘，他就投于张治中帐下。长沙临大请求张治中派遣高级将官沿途指导，张就找到了黄师嶽，黄师嶽也极愿承担。黄团长的名字师嶽，本书系根据杨式德日记以及一些同志的回忆。但据任继愈回忆（1999年6月26日来信），他记得当年黄团长亲笔出的布告，用的都是“黄师嶽”三字，他说，“黄团长是中将衔，他取名可能以岳飞为师”。任继愈是文科学生，注意行文遣词，他的回忆有一定道理。也可能行军途中，国难日益深重，黄团长思想发生变化，因此改了名字。

起初黄师嶽对学生的集合、整队、行军，严加约束，效果并不太好，后来就逐渐放松，个人体力不一，快慢难以一致，志趣相投的人同行，行军也变得轻松愉快。而且有着中午开水供应或加上一块烙饼打尖，晚饭总要集合起开饭，两者无形中约束着同学的行动，黄团长也可不必过分操心。只招呼伙房为一两位经常迟到的同学，如查良铮、刘兆吉留饭就可以了。

起初黄团长对同学玩扑克打桥牌看不惯，认为是赌博。经同学反复解释，而且他看到同学玩扑克确实只是一种游戏，没有任何赌博的影子，他也就放心不再禁止。这说明黄团长（包括毛鸿、邹镇华、卓超三位教官）的思想与同学逐渐磨合趋于一致。

黄团长随身有一名勤务兵，为他推着自行车。除了必要，如为了赶路，他很少骑。因之有一次与迎面过来的马帮相撞，受了伤，但他挣扎了几天，就照样上路了，倒赢得同学们几分尊敬。

黄团长随身带着一份行军地图图囊和一个小本子。行军图是随

时与眼前的地形相对照,增加些村庄、桥梁、公路等标记,他说,这都是作战所必需的,似乎他总也没有忘记硝烟弥漫的战场。那个小本子,是用来记录他碰到的同学的姓名、籍贯、出生地、学校、系别、年级。而有趣的是,只需碰面一次,他便会记下这些项目,没有多久,他就和同学们都认识了。问他,他说这是常年带兵磨练出来的,你和士兵没有感情,作战时如何让他们听从你的命令去冲锋陷阵。

在湘西凉水井到沅陵一带,遭遇土匪过路抢劫,黄团长起了镇定作用。团部决定旅行团乘车离开沅陵,固然因为雨雪封路,也是为了离开土匪出没地区,早日到达晃县。旅行团由湖南保安队护送出境到鲇鱼铺湘黔交界处。本书搜集到三张这两省交界处照片,一张画面是一个同学在鲇鱼铺湘黔交界处;一张是一大队六分队合影的黔湘交界处。还有一张是一大队五分队的部分同学认为可以作一些化装以防止受到传说中苗族放蛊的毒害(照片右2黄明信,右4刘维勤,右8黄培熙,右9林从焕)。

其实同学们对进入苗族地区的疑虑很快就转为想直接和苗族人民接触,有的向懂汉语的苗族同胞学习苗语,学唱苗歌,黄团长带头去寻找苗族同胞,终于在3月26日在炉山组织了一次与苗族中的仡佬族联欢会,黄团长以其豪饮应付了苗民的热情劝酒,曾昭抡先生则被劝饮得酩酊大醉。

同学们用唱歌作为对苗民表演跳舞的答谢,黄团长则舞了一回手杖作为表演。只有李继侗先生优雅地和徐医官跳了一曲无伴奏华尔兹舞,令人不能忘怀。

五、湘黔滇三省地方政府对旅行团的热情支持

旅行团的行程所以能顺利抵达,固然是由于团部正确领导和同学不畏险阻,但与湘黔滇三省地方政府对旅行团的热情支持也是密不可分的。

在湖南境内,保安队的不时保护,对旅行团的安全起了一定作用。旅行团一进入贵州境内就受到热情接待。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没

有川黔滇军阀的习气，颇想励精图治，任用了一批年轻的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的学生做县长，贵州省教育厅厅长是清华学堂时期的老校长周贻春，在省府任事的大夏大学迁至贵阳的吴泽霖教授，1938年以后就到联大任教了。

旅行团3月17日到了玉屏，街上已贴上了3月16日县长刘开彝颁布的玉屏县政府布告：“查长沙临时大学近由长沙迁往昆明，各大学生徒步前往，今日可抵本县住宿，本县无宽大旅店，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概为各大学生住宿之所。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特此布告，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此布。”

有了这张布告，旅行团的设营员不仅不需要费很多力气去号房子，而且旅行团成员得到很高的评价，被称为“振兴民族领导者”。玉屏县的县长、各界代表、停了课的小学生一起列队欢迎旅行团。

继之3月20日旅行团走到镇远县，3月21日在镇远师范召开了镇远县各界欢迎会，师范校长是北大毕业生，招待热情，请曾昭抡先生讲国防问题。师范学校还备有茶点以及清唱等余兴。在贵阳扶风山下山前小亭，旅行团接受了吴鼎昌招待的野餐。晚饭后清华同学参加了清华同学会贵阳分会的招待会（贵阳有清华校友30余人）。

面对地形险峻的贵州，对于旅行团员来说无论是体力或是胆识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3月22日他们经过镇雄关，巧夺天工的鹅翅膀，3月28日过黄丝镇，去江西坡，到贵定，经过那段几乎需要手足并用的滑溜溜的草地。从镇宁到关索岭下的灞陵桥之间行经24个之字的盘山公路，还有险渡盘江天险。当然他们也有幸观赏到大自然的奇景，白水河的大瀑布和黄果树的大瀑布，奇妙的熔岩洞牟珠洞、碧云洞和火牛洞。对于少数民族的习俗和语言产生兴趣的同学，路上碰到热闹的赶集，会使他们留连伫步。

离开贵阳不远进入平坝县，年轻的黄县长是毕业于中央政治学

校的成员之一,丝毫没有官僚架子,他谈起禁烟改革种种措施表现出来向恶势力斗争的精神,给人印象深刻。夜间,他亲自到同学就寝处查看,次日,一直陪送同学走到天龙镇公路。但后来听说他被当地恶势力残酷地杀害了。

过了盘江,云南省政府就派来行李车,替旅行团接运行李。不久过了胜境关,一片云南风光。4月19日抵达云南平彝县(今富源县),受到县长的欢迎和欢宴。地方政府对旅行团的热情关怀,连绵不断,把旅行团送达昆明。

六、旅行团的日记

旅行团是重视日记的。众所周知团部指定丁则良(清华史四)、高亚伟(北大中四)、杨桂和(南开经三)三人为日记参谋,全面记录旅行团活动,写成药20万字日记,带到香港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日记未能出版。

教师和同学都很重视写日记。旅行开始,2月26日袁复礼就向同学讲要记日记,并要科学地记载。说他在中国旅行了17年离不开记日记。袁先生带着14名地质组学生(陈庆宣当时是化学系一年级,追随袁先生到昆明后始转系)每天爬上爬下敲敲打打,但到夜里一定要画下当天的地质图。曾昭抡先生每天记日记到深夜。许多同学也都辛苦地记日记,但几十年来得以流传在社会的多亏了吴征镒先生的《“长征”日记》。吴征镒先生说:“当时没有功夫记详细日记。《笳吹弦诵》上所登已是当时我手中还有的草写每日简记整理的,别无更详细的日记。”(1997年7月2日复信)。李继侗先生的女儿李德津告诉我,她亲眼看到过李先生保存的旅行团日记,但由于李先生支援内蒙,家庭辗转迁徙,日记不知到何处去了(1997年5月2日晨电话)。许多人都说他记了两大本日记,但连同像片在史无前例之中丧失了。

本书新搜集的有1997年春杨式德子女给我们的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随后有余道南之子给我们的《三校西迁日记(北大、清华、

南开自长沙至昆明)),1998年夏有董奋给我们的《董奋日记》(只找到在长沙和抵昆明两部分)。其他人手中或许还保存有日记,但已是可遇而不可求了。

学校的教员对旅行团的学生出发后究竟身体状态如何,能否适应还是很关心的。潘光旦和庄前鼎两位先生自长沙坐汽车来看望同学,3月3日在毛家溪一带看到同学,杨式德日记记下了早饭集合时看到两位先生身穿草鞋像是要走路的样子。

杨式德日记反映出杨式德既是一位规规矩矩的学生,仔细地记录所见到的事物,而且又是一位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喜欢比较所见作出评断。他从下船开始,就在分析比较河北河流与南方河流的不同,观察湘西水田利用简单机械磨木浆准备造纸等等。对于同学钱尚忠玩的扑克牌算点数的游戏,他使用心把游戏的计算原理导出来了。他经常读一段工程力学,经常读一篇英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作为消遣。唐云寿(外四)看的过去与当代的政治讲演集他也拿来朗读。

他们小分队也注意吸取各方面知识,3月18日地质组在青溪东边河水南面发现有三叶化石,晚饭后,杨式德和白家驹、张一中、王玉哲、范寿仁等过河去找化石。旅行团进入云南后,在曲靖到马龙之间的村庄中也找到化石,大部分是海螺化石。

他们讨论的问题有的比较深刻,以唐云寿、王鸿图为主讨论到中华民族缺乏一种灵魂 soul,一种生气 vitality,这需要一种伟大的哲学把他建立起来,好像马克思哲学对于苏联一样,他们认为这是当今中国哲学家最有意义的任务。

他很注意时事。在贵阳他到省立图书馆去查报刊杂志,查到1938年当年一月份《亚洲》(Asia)杂志有一篇文章是日本海军中尉 Michitaka Hiramots 写的《小游南京》(Little Visits To Nanking)他叙述1937年8月13日和8月15日日机两次轰炸南京的事,得意洋洋,认为是对中国的应有惩罚,他说,中国的空军是吸食鸦片的,不堪一击。杨式德读后心里气愤异常,接着他抄录了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 针对上文写的批评文章《军国主义者的心态》中的两段,“日本不仅强暴侵犯中国,而且残酷地伤害了上述所有的人们”,“我记得我所认识的日本,我如此称道的审慎塑造的美,我赞赏的彬彬有礼。而我同时感到我心目中的日本已经被杀害了”。

在镇远,他遇到一位清华七级化学系毕业的同学,说镇远是山谷间一片冲积平原,自汉人来了以后,苗民逐渐退到山里。基督教在这里设立教堂,以英文字母拼写苗民文字,我们本国人和他们还很少接触,而侵略者早已深入了,这实在是很痛心的事。

杨式德的日记还保留了一部分正统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保留的史料,3月23日他们走到黄平附近“飞云岩”的一溶洞“黔南第一洞天”。抄下了和珅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中旬,奉使过贵州,登临飞云岩胜境,所作的赞赏飞云岩景色七言转韵四十句。这在清代应属于逆书,被保留下来很不容易,可见和珅有他才华过人的一面。山间还有果勇侯杨芳在道光年间写的“海山飞来”四个大字。这些遗迹不知道今天是否仍在壁上。

杨式德的日记可以看作旅行团留下的一部信史。参加旅行团总的来说,是增强体质,但也有例外,杨式德体质太弱,3月28日走到黄丝镇,过两个很大的山坡后,便“头昏眼黑,一阵倦痛,几乎不能自持,在路上坐了片刻,才静下来”。到了贵阳,4月2日,本想去黔灵山,但“骤然一阵头痛”。这些迹象,联系到他后来所患脑部疾病,可能是这时伏下隐患。

七、对旅行团的评价

1. 抵昆明后受到的欢迎与赞扬

旅行团4月28日平安抵达昆明,受到先行抵达昆明的教授、教授夫人和同学的热烈欢迎。黄钰生传达教育厅的赞扬说要把旅行团的照片送到国外去宣传。

有人传说胡适曾评论旅行团是“世界教育史上的新篇章,可以说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胡适是长沙临大到西南联大虚位以待的文